

第一章 緒論

第一節 研究動機

進入研究所後，在「明代文學專題研究」的課程中，嘗以《明史·文苑傳》的閱讀，作為觀察明代文學發展的津梁。研讀之後，接觸到地域文學的概念，開始對主流文學思潮之外的文學流派產生好奇，如福建的閩中十才子、廣東的南園五子、金陵的吳中四傑等，這些以地域劃分而形成的團體，提供了另一個視角，讓我們對明代文學的理解，增加了更多的樂趣。

有鑒於明代詩文的探討，長期以來著重在勳閣大官的論述，如劉基、宋濂、三楊及李東陽諸家，這些位居朝廷的精英大臣，他們的文學確有值得研究之價值，若僅以這樣的角度，似對明代文學的了解缺乏了全面性。如果從《明史·文苑傳》的描述來看，其所提及的文人來自不同的地域，包括福建、廣東、廣西、江蘇、浙江等南方作家，從這個方向觀察，我們不僅能得知在朝廷重臣之外的作家，擴大了作家的書寫隊伍後，就能豐富明代詩文的寫作內容。

另外，明代的復古風氣主導著當時的文學發展，前、後七子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人物。然而，我們可以發現，復古陣營的人數相當眾多，誠如香港科技大學陳國球教授所言：

「前後七子」之目並不適宜作為復古思潮的標誌，因為若果以這個思潮的廣泛影響和普及程度為論，只標舉前後十四人實在有所不足。¹

在這樣的思考下，我們可以發現廣五子、續五子、末五子都值得再深入研究。在後七子的復古隊伍中，歐大任被列為廣五子的一員，同時也是嶺南的著名詩人。因此，若將地域文學與復古派思潮的概念加以結合，歐大任的文學思想，就值得我們深入探討。

南方地區自北宋以來，人口不斷地增加，人數北多於南的情形就此倒轉，尤其明代萬曆六年²的統計，南京、浙江的戶數更是大大超越了其他省份²，文化活動亦逐漸活躍。明代建都於北京，但經濟、文化活動中心仍在南京，南北地域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，南方成了文學發展的重心，正如李東陽所言：

¹ 陳國球《唐詩的傳承—明代復古詩論研究》，台北：臺灣學生，1990年，頁327。

² 陳正祥《中國文化地理》：「明萬曆六年，官書統計南方計有8200180戶，北方僅3422256戶。南方的南直隸，獨佔2069067戶；加上浙江的1542408戶，便超越了整個北方的戶數。又南直隸的蘇州府、松江府、常州府的戶數合計，更超過了中原河南、陝西兩省的戶數。」，台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84年，頁9。

文章固關氣運，亦繫於習尚。周召二南、王豳曹衛諸風，商周魯三頌，皆北方之詩，漢魏西晉亦然。唐之盛時稱作在選列者，大抵多秦晉之人也。蓋周以詩教民，而唐以詩取士，畿甸之地，王化所先，文軌車書所聚，雖欲其不能，不可得也。荊楚之音，聖人不錄，實以要荒之故。六朝所製，則出於偏安僭據之域，君子固有譏焉，然則東南之以文著者，亦顯矣。本朝定都北方，乃為一統之盛，歷百有餘年之久，然文章多出東南，能詩之士，莫吳越之若者。而西北顧鮮其人，何哉？³

江南的詩文發展在明代漸成主流，這些地區的文人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，並逐漸形成以地域為連繫的活動單位，其中包括了福建的鑿峰詩社、杭州的南屏詩社、廣東的南園詩社、新安的白榆社⁴等。這些文學性組織的形成，似乎成了我們觀察地域文學發展的重要依據，能讓我們在朝廷重臣的文學之外，讀到更為貼近生活的作品。而我們可以發現，廣東鮮少文學上的成就，但到了明代，卻一躍成為文學的流派之一。即如胡應麟《詩藪》中所云：

國初吳詩派昉高季迪，越詩派昉劉伯溫，閩詩派昉林子羽，嶺南詩派昉孫蕡仲衍，江右詩派昉於劉崧子高。五家才力，咸足雄據一方，先驅當代。

5

元末明初，由南海平步（今順德）的孫蕡，南海的王佐，及番禺的黃哲、李德、趙介在廣東南園同結詩社，透過群體的詩歌唱和、相互影響，不僅形成風格相似的文風，其深具特色的詩作，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情形。只是除了孫蕡有《西庵集》傳世外，其餘四子的作品皆散佚，現僅能從《廣州四先生詩》及陳暹所輯《南園前五先生詩》⁶窺其一二。

相隔一百多年後，黃佐承繼孫蕡等人寫實的詩風，並於廣東講學，在他門下的弟子，亦擅吟詠詩歌，其中順德的歐大任、梁有譽，從化黎民表，番禺李時行及南海吳旦再結詩社，由於同聚於南園，故稱孫蕡等人為前五子⁷，歐大任等人則為後五子。歐大任等人結社之際，正值復古思潮盛行，而梁有譽、歐大任及黎民表更先後成為加入復古陣營中，分別成為後七子、續五子、廣五子⁸的一員。

³ 李東陽《麓堂詩話》，《歷代詩話續編》下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，頁1377。

⁴ 郭紹虞〈明代的人文集團〉，收入《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》，台北：丹青圖書有限公司，1985年，頁342-434。

⁵ 胡應麟《詩藪·續編》卷一，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68年，頁337。

⁶ 孫蕡等著，梁守中、鄭力民點校：《南園前五先生詩、南園後五先生詩》，廣東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1990年。

⁷ 南園詩社最早由黃佐所編《廣州人物傳》提出，其在〈趙介傳〉中有「結社南園」、「五先生」等詞出現。因此，南園五先生（子）名稱是後人目其先哲之辭，後五子之名乃是相對於前五子而來。黃佐《廣州人物傳》作於嘉靖年間，不免沾染了明中葉詩壇評詩的集團風氣影響，在團體意識及地域意識的結合下，而形成以團隊來命名的方式。詳見高建旺、郭永銳：〈南園五先生來歷考論〉，《山西師大學報》，第33卷第3期，2006年5月，頁75-78。

⁸ 王世貞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卷十四，台北：偉文圖書出版公司，1976年，頁1060-1063。

其中，梁有譽身為復古派的核心人物，對復古思潮與嶺南文學的交流，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，可惜梁有譽年僅三十六即卒，所存作品不多，影響自然有限。另外，黎民表的著作，現存有詩集《瑤石山人詩稿》、《清泉精舍小志》二種，文章的部分只存九篇，較難以看出黎民表的文學主張。歐大任的詩文作品本來不易讀到，後因「四庫禁燬書叢刊」及「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」的影本重現，讓我們得以有研讀的機會。

歐大任（1516—1595）字楨伯，號崙山，廣東順德人。飽讀詩書，卻八次應鄉試不得，後以歲貢生身份作官。因為從事較為低階的官職，沒有繁重的公務壓力，讓歐大任有更多的時間來創作詩文。因此，歐大任隨著四處任官之際，將遊憩、贈答、抒發之作一一集結，成《歐虞部集》，內有《百粵先賢傳》四卷、《思玄堂集》八卷、《旅燕集》四卷、《浮淮集》七卷、《輶中稿》一卷、《廣陵十先生傳》一卷、《游梁集》七卷、《南翥集》一卷、《北轅艸》一卷、《廳館集》四卷、《西署集》八卷、《秣陵集》八卷、《詔歸集》一卷、《蘧園集》二卷、《虞部文集》二十二卷，凡七十九卷。然據其行狀及家傳，《蘧園集》原有十卷，今缺八卷，《虞部文集》七十卷，今缺四十八卷，另有《家乘》二十卷今亦未見，故我們僅能就現存的著作加以察考，實為可惜。

以李攀龍、王世貞主持的後七子主導著當時文風，文人間相互標榜，共結同盟，藉以擴大文學影響力，大任正在這樣的時機點加入復古派陣營。因此，對歐大任的文學、文友之深入研究，不僅能掌握後七子與當時文人的交友狀況，尤其是對王世貞部分的了解，希望能藉此提供另一觀察的方向，使後七子的復古集團研究更形完整。

第二節 研究目的

明代開國以來，在政治力的推動下，朱子學派登上了文化的主導地位，透過科舉制度的特殊宣傳方式，達到以理學治國的目的。雖然維持了社會的安定，經濟也逐漸復甦，然文學成了道德說教、歌功頌德的工具，致使詩歌的創作走向了僵化的地步。弘治、正德時期，前七子以復古為主張，強調詩歌應「主情」，著重文學的美感，在文壇上形成一股具大的復古風潮。然礙於復古主義最終走向模擬的道路，使得復古思潮在此告一段落。到了嘉靖、隆慶時期，以王世貞、李攀龍為首的後七子，再次豎起復古的旗幟，在前七子「格調說」的基礎上繼續發展。

嘉靖之後，明世宗對朝政長期荒廢，讓政治環境更加腐敗，奸臣嚴嵩仗著權勢，恣意妄為、貪贓枉法，許多的朝政官員不肖與其同流合污，以反對嚴嵩惡勢力為目標，形成一種政治結盟。因此，後七子的結合較前七子而言，除了文學上的氣味相投外，在政治的主張上，亦屬同一陣線。正如浙江大學廖可斌教授所言：

後七子復古派成員基本上都參加了反對嚴嵩及其黨羽的鬥爭。後七子復古運動不僅是一場文學運動，而且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。在它的發展前期，它與反對嚴嵩集團的鬥爭緊密相關。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，沒有反嚴嵩集團的鬥爭，就沒有後七子復古運動。⁹

後七子興起於嘉靖中後期，由於王世貞、李攀龍、梁有譽等人多為刑部官員，才能結社唱和、相互標榜，七子之名逐漸遠播。此時，文壇結社的風氣亦盛，各個社團之間，爲了讓文學主張得到更多人的認同，彼此拉攏、推崇，藉以擴大社團的影響力。而後七子在復古主義浪潮的推波助瀾下，站上文壇的高峰，王世貞繼李攀龍之後，更如同共主一般，獨操文柄二十年。

這股勢力，讓大部分的文士追隨了後七子的腳步，走上「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」的道路。歐大任先與梁有譽、黎民表等人同結詩社，之後又加入復古派陣營，成爲後七子、廣五子、續五子的成員。因此，對歐大任的研究，不僅能了解地域文學的發展，更能與當時的復古派文學相接軌。大任雖非後七子的核心人物¹⁰，但其參與了後七子的興盛、衰微，成爲我們觀察復古派發展的不同視角。

因此，本文以歐大任爲出發點，了解大任的生平事蹟、文學活動之概況，並兼及南園後五子的探討，以作爲研究明代中後期廣東地域文學的主體，既可一方面了解邊緣文學的發展，藉由其與復古派的來往，又可從側面得知復古派在廣東的影響力。綜合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有五：

- 一、對歐大任文學的研究，可以補爲一般文學史論述之不足。
- 二、從後七子集團的次級人物，觀察明代中後期的文壇發展現況。
- 三、了解後七子集團文學思想對廣東地區文學之影響。
- 四、從地域文學的觀點，敘述明代廣東地區文學發展的景況。
- 五、交誼考的資料，可以補《明人傳記資料索引》不足。

第三節 前人研究回顧

關於明代中後期的詩文研究，向來以復古派研究爲主，且多只針對王世貞、李攀龍、謝榛作敘述，後七子的其他人或其陣營的人往往略而不談，讓復古派的文學研究失去了全面性的觀照。就文學史研究的部分而論：

劉大杰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¹¹第二十四章〈明代的社會環境與文學思想〉將論述的重心仍放在王、李身上，雖論及謝榛及宗臣，但尙有三人沒有論及，則復古後七子的詩作、理論各爲何，實令人難以得知；而章培恆、駱玉明所編的《中國文學史》¹²對後七子的部分，僅針對李攀龍、王世貞與謝榛加以說明，不過

⁹ 廖可斌《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，頁193。此書與台北文津出版社在1994年所出版之《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》內容略有出入。

¹⁰ 本文所謂的核心人物是指王世貞、李攀龍、謝榛等後七子。

¹¹ 劉大杰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90年，頁926-942。

已注意到此一文學集團的形成，但對「後五子」、「廣五子」、「末五子」等人，則一語帶過，缺乏更進一步的描述。謝无量《中國大文學史》¹³除略論後七子各自的生平、主張外，另將復古集團中的人物大量羅列，間接說明了復古思潮在文壇所產生的影響。游國恩《中國文學史》¹⁴已經觀察到文學集團或文學流派對明代文學發展的重要性，後七子的形成是文學相互抗爭下的產物，走的還是前七子的錯誤道路，對於後七子的詩文採取較為否定的看法，對個別的評論，尤其是李、王的作品，只覺是陳詞濫調的堆積；另外戚世雋、董上德所編《明清文學史》¹⁵觀察到明代中葉之後的文壇有流派的情況，在後七子的部份，對宗臣提出關注，這是他書所無的。而在主流的文學論述之外，還提及吳中的文壇發展。

王世貞援引歐大任為「廣五子」，成為延伸後七子集團中的重要一員，我們若要了解當時的文學思潮，勢必對後七子要有所了解。而關於後七子方面的論文，以七子派為整體研究的，包括：龔顯宗《明七子派詩文及其論評研究》（文化博論，1978）、黃雅娟《明代詩情觀研究—論「七子」與「公安」詩論之異同》（東海碩論，1987）、楊英姿《明代復古詩論「緣情比興」說》（中山碩論，1995）、李欣潔《明代復古詩論重探》（清華碩論，2001）。對後七子個別研究的，包括：龔顯宗《謝茂秦之生平及其文學觀》（政大碩論，1972）、黃志民《王世貞研究—以其生平及其學術為中心》（政大博論，1976）、許建崑《王世貞評傳》（東海碩論，1976）、朴均雨《王世貞詩文論研究》（政大碩論，1989）、黃慧禎《王世貞詞學研究》（東吳碩論，1996）、何永清《四溟詩話研究》（師大博論，1997）、卓福安《王世貞詩文論研究》（東海博論，2002）、林立中《謝榛《四溟詩話》批評論研究》（高師大碩論，2003）等數篇。

可以發現後七子的研究，著重在王世貞、謝榛的部分，其他五人所得的關注相對較少。

對於地域文學、文人集團相關的論文著作不少。早期梁容若在《中國文學史研究》中，提出〈中國文學的地理觀察〉，除了說明南北文學的差異，更進一步論述作家與地域性¹⁶的密切關係，標舉出各地文人的風格類型，從地理的因素，大體解釋各個地區的文學共同特徵¹⁷。袁行霈在《中國文學概論》第三章〈中國文學的地域性與文學家的地理分佈〉，以專章討論地域對文學的重要影響，明確地說明中國文學因豐富的自然環境而衍生出多樣的風格作品¹⁸，並列舉了鄒魯、荆楚、金陵、江浙、嶺南等地，作了簡要的勾勒。簡錦松的《明代文學批評研究》

¹² 章培恆、駱玉明主編《中國文學史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97年。

¹³ 謝无量《中國大文學史》，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8年，頁578-584。

¹⁴ 游國恩《中國文學史》，台北：五南圖書出版公司，1990年，頁1137-1141。

¹⁵ 戚世雋、董上德《明清文學史》，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1999年，頁19-27。

¹⁶ 所謂的「地域性」即是指空間因素的部分。金克木在〈文藝的地域學研究設想〉一文中說到：「我覺得我們的文藝研究習慣於歷史的線性探索，作家作品的點的研究；講背景也是著重點和線的補托面；長于編年表而不重視畫地圖，排等高線，標走向、流向等交互關係。是不是可以擴展一下，作以面為主的研究、立體研究、以至於時空合一內外兼顧的多“維”研究呢？假如可以，不妨首先擴大到地域方面，姑且說是地域性研究。」見《讀書》，1986年第4期，頁85-91。

¹⁷ 梁容若《中國文學史研究》，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85年，頁43-74。

¹⁸ 袁行霈《中國文學概論》，台北：五南圖書出版公司，1988年，頁41-60。

¹⁹，則專章討論明代中期的蘇州文人集團現況。黃卓越的《明中後期文學思想研究》²⁰在簡錦松「蘇州文苑」的基礎下，對明中期吳中的文學傳統與新變，提出深入的探討。

以地域文學方向來寫作的文學史於近十年來一一出版，如：陳永正主編的《嶺南文學史》²¹、李伯齊《山東文學史論》²²，馬清福《東北文學史》²³。另外，還有陳慶元《文學：地域的觀照》²⁴一書專論福建的文學發展、陳建華《中國江浙地區十四至十七世紀社會意識與文學》²⁵對江浙地區文學與社會的關係加以考察、李玫《明清之際蘇州作家群研究》²⁶則探討了明清時期的蘇州作家群的劇作。可見，對於文學的研究，文體的演進、作家作品的評論固然重要，以地域的角度作為研究文學發展，似乎提供我們另一種觀察文學的視角。

此外，以地域的主題作為碩博士論文題目的，包括了：林得賢《明代中葉吳中名士詩歌研究》（師大碩論，1986）、范宜如《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——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》（師大博論，2000）、蔡幸娟《中國文學中「地域觀」的發展：以文人與民歌之關係為主要範圍的探討》（清華碩論，2000）、江仰婉《明末清初吳中詩學研究——以分解說為中心》（中正博論，2001）、丁威仁《明洪武、建文時期地域詩學研究》（東海博論，2005）等數篇，研究的地域都集中在吳中、江南一帶，對其他地域的討論極少，其他的地域文化所受關注顯然不足，而且也缺乏個案性的研究。

在單篇論文、期刊部分，直接論及「南園後五子」的相關文獻不多，以下所介紹的論文主要牽涉「廣東文學」、「地域文學」、「文人集團」等三個方面，並擇要者作一簡單的評述。

一、白雪〈論文學風格的地域性〉：延續劉師培、梁啟超以南北兩大地域的角度，闡釋文學風格的差異，並指出南北在語言、創作原則、藝術表現手法上等方面的不同。而隨著文化交流的頻繁，交通的逐漸發展，南北風格對比不再強烈，取而代之的是局部、小面積的地域風域特色，甚或表現在城與城的差異上，呈現出更豐富而多元的地域文學。白氏的論述清楚而簡約，讓我們在地域與文學風格的關聯上，有更明確的理解。²⁷

二、曾大興〈中國歷代文學家的地理分布——兼談文學的地域性〉：本文從地域角度探討中國歷代文學家分布不均的狀況，提出四個影響文學家分布重心的要素，包括京畿之地、富庶之區、文明之邦、開放之域，以這四點觀察文學重

¹⁹ 簡錦松《明代文學批評研究》，台北：臺灣學生，1989年。

²⁰ 黃卓越《明中後期文學思想研究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。

²¹ 陳永正《嶺南文學史》，廣東：廣東高等教育，1993年。

²² 李伯齊《山東文學史論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3年。

²³ 馬清福《東北文學史》，瀋陽：春風文藝，1992年。

²⁴ 陳慶元《文學：地域的觀照》，上海：上海遠東出版社，上海三聯書店，2003年。

²⁵ 陳建華《社會意識與文學》，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1992年。

²⁶ 李玫《明清之際蘇州作家群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0年。

²⁷ 本文刊於《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》，2003年第6期，頁76-78。

心的移轉，並讓我們藉地域性考察文學作品的多樣性及豐富性。更重要的是，本文提供了每個朝代各地作家人數消長的情況，這對本文的研究不無益處。²⁸

- 三、郭英德〈中國古代文人集團論綱〉：此文探討先秦時代以來，文人組織的性質變化，針對不同時代所展現的不同特質，讓我們對中國古代文人集團有一總體的認識。²⁹
- 四、郭英德〈論明代的文學流派研究〉：明代自弘治年間前七子派興起之後，文學權利之行使，不再侷限於王公貴族，一般士人已能自立，並以同聲相引重，進而黨同伐異，間接促成明代文學社團的普及。而社團相互爭論之下，讓文學風氣產生轉變的契機，其中主要社團之文學主張領導文壇的風氣，遂有文學流派之形成。因此，社團之興衰影響著文壇風氣，而前、後社團之紛爭，則使文學有走向創新的動力。此文分析相當精當，點出了文學社團與文學流派互為因果之關係，充分揭示了明代文人集團研究的重要性。³⁰
- 五、陳永正〈嶺南詩派略論〉：本文自唐張九齡起的嶺南詩歌發展，一一加以說明。由於特殊的地理影響，讓廣東形成獨具特色的詩風，進而發展出有別於主流文學的作品，成為明初五大詩派之一。在簡略說明後，可以讓人清楚明瞭地看出嶺南詩派逐漸成型的脈絡。³¹
- 六、譚赤子〈南園詩社—嶺南詩壇的第一個交響樂章〉：本文針對南園前五子的結社活動加以探討，說明前五子的結社不僅開嶺南風氣之先，更具有引領廣東一地詩社發展的作用。文中點出前五子詩作中富涵嶺南特殊風土民情的部分，成為我們觀察明代初期廣東文學發展概況不可缺之資料。³²
- 七、李緒柏〈明清廣東的詩社〉：此文探討廣東詩社發展原因，並涉及廣東詩社的功用。文中羅列出明清時期廣東一地著名的詩社，只是對各個詩社描述過於簡略，無法讓人了解各個詩社的文學活動及特色。儘管如此，本文卻能讓人看到明清廣東文學（詩社）較以往活躍的狀態，似乎亦點出廣東文學仍有被探索的廣大空間。³³
- 八、黃志民〈明人詩社淵源考〉：本文主要探討明代以前的結社情形，包括最初的士大夫雅集及易代之際因戰亂而勃興的結社活動，在逐步地說明下，使人理解明代文人結社活動的活躍不是猛然興起的現象。³⁴
- 九、黃志民〈詩社活動現象及其意義〉：詩社自此宋末年出現後，以文會友成為

²⁸ 本文刊於《學術月刊》，2003年9月，頁88-94。

²⁹ 本文刊於《中國文化研究》，1996年夏之卷，頁9-15。

³⁰ 本文刊於《求是學刊》，1996年第4期，頁83-87。

³¹ 本文刊於《廣東文史》，1999年第3期，頁13-15。

³² 本文刊於《廣東農工商管理幹部學院學報》，第16第1期，2000年2月，頁81-84。

³³ 本文刊於《廣東社會科學》，2000年第3期，頁122-128。

³⁴ 本文刊於《中華文苑》，1973年3月，頁33-55。

詩社的重要特質。但隨著時代的變化，詩社受政治、經濟因素的影響，呈現逐漸南移的狀況。而詩社的形成除了使文人多了發揮見解的場所外，更間接的促成詩派的產生，這無疑說明了明代結社與文學潮流之相關性，讓我們更明白詩社研究是了解明代文學發展不可缺的方向之一。³⁵

十、王祥〈試論地域、地域文化與文學〉：本文在多方面理解地域、地域文化的定義下，提出“地域文學場”的概念，強調地域文學研究具有多元的面向，需將地域、地域文化、地域文學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，才能建構出地方性之特色，並在地域與地域文化的影響下，探索地域文學發展之規律，從而豐富、深化文學的研究。可謂對地域文化、文學概念作了一精闢之解說。³⁶

十一、余祖明〈廣東明清兩代詩社與其詩人考〉（上中下）：本文將廣東明清時期的詩社加以考察，始自明代南園，至清末小畫舫齋止，共對二十二個詩社作一初步整理，除了可使我們了解廣東詩社的發展狀況外，更提供了明清時期的地區文人生平史料，讓我們對廣東的文人有一基本的認識。³⁷

十二、龔鵬程〈區域特性與文學傳統〉：說明以地區作為文學的分類指標，其文學需顯示出共同創作趨向及風格特徵，而詩社的發展，則是造成各地文風興盛的重要因素。另外，文學風格的選擇與形成，主是是一種文化價值的認定與追求，與地域之間不應畫上等號，才不會陷入環境決定論的思考中³⁸。

單篇論文、期刊的閱讀，能提供我們初步而多面的概念。當然，本論文所參考的期刊不僅僅上述幾條，其他地域文學的期刊，如鄭利華：〈明代中葉吳中文人集團及其文化特徵〉³⁹、羅宗強〈弘治、嘉靖年間吳中士風的一個側面〉⁴⁰；或是有關後七子部分，如汪世清：〈明後七子及其交游生卒補考〉⁴¹、李聖華：〈略論後七子派後期詩歌運動〉⁴²等篇，亦是我們可以參佐的資料，讓我們對歐大任同一時期的人物、社會有基本的認識，才不會造成歐大任的研究與主流的文學思潮斷了連繫。

³⁵ 本文刊於《文訊月刊》，1985年6月，頁50-55。

³⁶ 本文刊於《社會科學輯刊》，2004年第4期，頁123-128。

³⁷ 本文分別刊於《廣東文獻》，第12卷第1期，1982年4月，頁5-12、第12卷第2期，1982年7月，頁3-8、第12卷第3期，1982年10月，頁6-12。

³⁸ 本文收於《古典文學》第十二集，台北：臺灣學生，頁41-65。

³⁹ 本文刊於《上海大學學報》，第4卷第2期，1997年4月，頁99-103。

⁴⁰ 本文刊於《中國文化研究》，2002年冬之卷，頁17-34。

⁴¹ 本文刊於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》，1991年，頁31-50。

⁴² 本文刊於《鄭州大學學報》，第35卷第2期，2002年3月，頁111-115。

第四節 研究方法

對歐大任文集的梳理，為本論文的重要基礎。現存的《歐虞部集》有二部，分別是「四庫禁燬書叢刊」共十五種七十二卷，以及「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」共十五種七十九卷，都是清刻本。但前者少收《思玄堂集》八卷，又將大任記室李英所作《都下贈言》一卷列入，故本論文以「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」所出版之《歐虞部集》為據，通過對文本的細讀，再參考其他作家之文集，用交叉比對的方式，察考其生活經歷及交誼。

自然環境的蘊育，成為影響文人作品風格的重要因素之一⁴³。有明以前，廣東文學不但不發達，而且明顯滯後，自孫蕢等人所屬之南園前五子出，開啓嶺南的文學創作風氣，此後文人輩出，作品大量湧現，尤其是詩歌的表現，更形成獨具特色的嶺南詩派。因此，透過明代廣東文人作品的閱讀，為明代廣東文學的進展過程作一明晰的勾勒，不僅對歐大任的創作背景有一基本認識，藉由這樣的觀察，亦能在復古派的潮流外，找出屬於地域文學中的傳統與變化。

常見的「交誼考述」，多半僅選重要文學交遊的數人來論述，缺乏了全面性。因此，本文依大任交往時期的先後排列，就大任詩文集中所提及的人物，運用《明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》、《明人傳記資料索引》、《國朝獻徵錄》、《掖垣人鑑》、《列朝詩集小傳》、《皇明詞林人物考》、《無聲詩史》、《明畫錄》，各地方的方志，以及相關作者之詩文集，將與大任有往來的人文名士一一羅列。藉由上述資料的整理，與歐大任有往來者，竟多達四百餘位，其中還查考出部份於《明人傳記資料索引》未收錄之人物。因此，對歐大任的交遊對象的追查，不僅能建構出其交友圈大致狀況，更能成為觀察明代中後期文學活動的重要材料，以補一般傳記書籍之不足，進而能呈現更完整的詩壇概況。

此外，大任的交友名單中，不乏與南園後五子皆有往來者，本文亦將南園五子相關材料保留在本文中，雖不免雜亂，但對於後人研究南園五子交誼時，必有助益。

大任未曾寫過自成體系的文學理論，但我們可以依《歐虞部集》中的書信、序文等部分，整理出大任所提出的文學主張，建立其詩文觀。另就其作品加以分析，結合他人對大任詩文的批評，找出大任的文學特色。

年譜的建構，是了解一個人生平行事、活動的途徑之一。歷來未有研究歐大任者，因此，本論文建年譜、繫時事、証事件因果，進而知其人生際遇。並採綱目體的方式敘述，以綱記某事大要，目則用詩文佐證，使大任生平事蹟清楚易讀。研究方法雖然傳統，但有助於文學活動長期的呈現。此外，不論是大任的詩文創作，還是交誼考述，多有仰仗傳主生平事蹟之處，故年譜之書寫是建構本論文的

⁴³ 文學理論家泰納指出藝術（文學）的創作與發展，決定於三個要素，分別是種族、時代、環境。即所謂之「泰納三原則」。詳參法·泰納著，傅雷譯：《藝術哲學》，合肥：安徽文藝出版社，1991年，頁32。

重要基礎，然而礙於論文體例，則置於附錄，以供參佐。而年譜除將大任的生平作一詳實的考察外，對其友人亦兼加論及，所使用的材料與出處均一一註明，既能與交誼考參照，也能助益文壇形貌的描述。